

从现代性语境的悖论 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何中华

【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开始遇到的特定历史语境是为启蒙现代性所塑造的。这一语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具有“后现代”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做了某种必要的铺垫，也使人们在现代性意义上去解读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遮蔽掉它的后现代意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纠葛：在自觉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文化之间表现为“非此即彼”的对立；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又表现为“后现代”同“前现代”之间经过否定环节之后的彼此相遇。由此也可以解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文化何以在激烈冲突的表象下又实现着文化无意识层面上的会通这一事实了。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悖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湖南社会科学》（长沙），2020.6.35～41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如同150年前的欧洲一样，在20世纪的中国，理性批判的发现预示着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转变。”^[1]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恰是这一进程的最具典型性也最富象征意味的标志。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法国大革命意图实现的理想，对1919年发起五四运动的青年为什么仍有很强的启迪作用”^[2]这一现象了。其实，着眼于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大势，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经历了渐次由经济到政治再到往后的文化变革，其中潜伏着一个现代性的主题。尽管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援式的，但一经输入并且同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要求相契合，就有了自身的自主逻辑和轨迹。在此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所内蕴并追求的启蒙主题（尽管它们存在着改良与革命的差别）的文化意义上的继承者。因此，如果说“1905年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决非偶然的巧合”^[3]，那

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并捍卫的是启蒙精神这一现代性主题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对五四运动的启蒙含义，毛泽东做过明确的定性。例如，他在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一书时所作的批注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的，他[它]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4]博古在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所写的文章中也作过判定，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思想空前的大变动无疑地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他[它]反映着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与旧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博古的这个判断，其依据主要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两大目标，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这两个要求却正是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的要求”。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五四运动之为资本主义文化运动更可由他[它]提倡个人主义、人格独立等上看得明白。”^[5]李长之也认为：“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破坏的、清浅的。我们试看五四时代的精神，像陈独秀对于

传统的文化之开火,像胡适主张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新生活,像顾颉刚对于古典的怀疑,像鲁迅在经书中所看到的吃人礼教,这都是启蒙的色彩。明白与清楚,也正是五四时代的文化姿态。”^[5]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来说,“五四”时代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时期,它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却是启蒙性质的,属于现代性的范畴。作为特定的历史语境,启蒙现代性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深刻影响,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被启蒙化了,还是启蒙精神被马克思主义化了呢?这一启蒙语境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又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呢?这些问题对于恰当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带有某种前提性的意义。

既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开始遇到的特定历史语境是为启蒙现代性所塑造的,那么,这个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依赖”。正如博古所说的那样,“不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的狭隘和有限制性,但是……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光大传播的道路”^[4]。就启蒙现代性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起的促进作用而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同时也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早在1919年就说过:“我们对于陈君(即陈独秀——引者注),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6]后来他又数度把陈独秀称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①。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背景下才真正传入中国,这一契机意味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现代性语境以激进地反传统,因为不解构孔子的偶像地位,不打破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垄断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没有容身之地,从而无法进入中国。

在1923-1924年的“科玄论战”中,科学派把科学本身意识形态化,使其沦为一种“主义”,从而陷于科学的独断化。这正是典型的启蒙现代性的文化偏

好。恩格斯曾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7]在中国的科学派那里,这种理性尺度的至上性也有其鲜明的体现。在这场“科玄论战”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科学派曾一度携手,成为“同路人”。这一事实值得深入解读。诚如有学者指出的:“1923年的科玄论战以科学派胜利,预告了马克思主义将在中国大展宏图的前景。”^[8]

我们知道,当年科学派所秉持的一个重要信念就是进化论,而进化论观念恰恰构成启蒙现代性的基本预设之一。卡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着眼,指出:“达尔文革命的真正重要性在于……把历史带入科学领域。……科学上的进化观念确定了、完备了历史中的进步观念。”^[9]晚清以降,进化论观念曾成为当时中国的时尚,它甚至被用来为中国的近代变革作辩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同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之间又有着某种亲缘性。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就曾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提并论,作过著名的类比。在恩格斯看来,就像达尔文学说是说明生物界演化的科学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是说明人类历史进化的最恰当的理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进化论的信念何以能够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认同。

问题的辩证性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利用科学主义背景的同时,又不得不受到这一背景的遮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一上来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其最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所提

出的各种理论原则进一步的、也是更为彻底的发展。如同任何一种新的学说,它也不得不首先从现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尽管它在本质上植根于经济的特定事实之中。^[7]这一论断似乎过分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方面,未能充分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于启蒙精神的解构方面。这一偏颇却在五四运动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得到了强化。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式的人物^[10],在阐释马克思的学说时仍然不能避免这种局限性,譬如他就把孔德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端”予以定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历史语境,启蒙现代性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解读甚至塑造了一个启蒙意义上的马克思形象。这妨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肯定性的关系作出正确的把握和了解。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后启蒙性质的忽略,乃是时代造成的,我们不能苛责前人,但它毕竟在客观上使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周全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容易陷于形式主义的简单化误区。他们往往过分凸显两者之间对立和排斥的一面,而忽视了统一的一面和会通的可能性,以至于“很多[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孔子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者”^[11]。因为他们往往从线性的进化观出发,简单化地看待传统文化,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跌入肤浅的两极化思维的窠臼。毛泽东后来对“五四”时期这种激进反传统倾向存在的形式主义偏颇是做过清醒批评的。^[12]

马克思主义的后启蒙性质,被“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所塑造的特定语境遮蔽掉了,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冲突被推向了极致。因为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作愚昧之源,所以“‘五四’时期,儒家思想被斥为腐朽与没

落^[13]”。激进主义者认为,对中国社会而言,启蒙的任务就是彻底地反传统。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调和主流,就是在这一认知基础上被筹划和确立的。在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和后启蒙性被严重地忽视了。这既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启蒙意义上被解读,也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虚假对立。总之,它导致了双重的误解: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关系的误判,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误读。

施拉姆认为,“事实上,相比于中国五四时期的大多数同代人而言,毛泽东的西化立场转变要更为缓慢和勉强^[13]”。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正因为受到近代西方启蒙思潮的浸润之浅,所以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拥有了接纳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诚然,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和逻辑地扬弃近代启蒙精神的产物,但它毕竟是“后现代”的。所以,毛泽东的这个特点一方面有助于他接受马克思学说,但另一方面也使他对于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理解和阐释缺乏一个启蒙的内在环节。就此而言,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本身就是充满张力的。

毋庸讳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的运动。这同普罗大众的社会革命在主体上存在着某种疏离。在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所作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毛泽东总结晚清以来历次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主要的是在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尚未真正地动员起来^[14]。他认为,只有真正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能真正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4]。因此,毛泽东发出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们,必须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去动员和组织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这个主力军,仅凭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取得反帝

反封建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们必须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14]在稍早的一篇纪念文章《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就强调指出:知识分子倘若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判断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抑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标准,就在于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4]显然,这里暗示了五四运动本身的局限性,委婉地批评了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倾向及其缺陷。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从总体上说是“无根”的。

早在1918年,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就写道:“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15]1919年,毛泽东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民众大联合乃是国家和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唯一可能的路径。他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6]他指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6]这标志着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唤醒和自觉。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强调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人民本位思想和人民史观,既固有其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子,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主体论的立场。孟子通过对历史教训的反省,对民本思想作了经典阐发,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对此,朱熹

诠释道:“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朱熹:《孟子章句集注》)这种民本立场,无疑以扬弃的方式被积淀到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人民史观之中。而且,毛泽东的人民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主体论也是内在地一致的。马克思说得好:“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6]列宁也曾指出:“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17]毛泽东强调“向群众寻求真理”^[18]。他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民群众就是人类历史的“特选子民”,它既是解放者,又是被解放者;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这种集于一身的双重角色,恰恰意味着人民群众对于历史本身而言所具有的本体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被艾恺称作“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所提出的从农村、农民入手去确立“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径,同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联。耄耋之年的梁漱溟在回顾自己一生时曾说过:我们“可以说入手相同,他(指毛泽东——引者注)的革命的入手是农村包围城市,他入手是农村,我要建设新中国,我也是入手是农村,从入手是相同”^[19]。尽管有着毛泽东同梁漱溟的延安窑洞之争和新中国成立初的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之争,前者涉及中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后者涉及“大仁政”和“小仁政”的纠葛,但这些分歧无关宏旨,并未危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更深层面的兼容。毛泽东认为,“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18]。这种对农民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肯定和褒扬,既折射着儒家传统的“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也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的历史

主体角色定位相一致。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隐含着民粹主义倾向。对此有必要加以澄清。魏斐德认为“毛泽东的第一篇重要政治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虽然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还处在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和民粹派的阶段”。他还指出:“毛泽东的民粹派文章准确反映了1919年夏季社会骚动的特征。”^[20]施拉姆认为:“此文(指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引者注)即使没有预示毛泽东将会在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但的确标志着他在思想上出现了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倾向的极其重要的一面。”^[21]当然,施拉姆所说的“民粹主义”是在广义上使用的,他解释道:“毛泽东上司李大钊早已开始产生农民重要并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的思想。其见解与俄国民粹派并无不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还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他并不特别关心农民。但是,他曾经是,当然仍然是广义上的‘民粹主义者’。”^[22]迈斯纳也认为:“在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的1919年,他就倡导过‘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而这种民粹主义思想也影响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23]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阶段以李大钊的理论文章最具有代表性,……他的这种接受和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中国化’的特色。这特色使他不同于陈独秀,而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倒有一脉相承之处。”^[23]这最集中地体现在两方面,即民粹主义的色彩和道德主义偏好^[23]。从李著脚注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判断乃是受到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之启发。杨荣国则对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作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在这一篇重要论文中,毛泽东同志不仅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上,给予文化思想界以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他论证了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论文指出,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

就必须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入群众,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用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向反动统治作斗争。”^[24]受时政氛围的影响,这一评价显然有拔高之虞,因为毛泽东本人承认自己到了1920年才真正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曾多次明确强调反对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拒绝社会的大工业经济基础,试图绕开民主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革命不能超阶段地发展则有着清醒的自觉。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14]后来,他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中又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是实行新民主主义。“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12]显然,毛泽东是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历史条件及其约束的。毛泽东在给秦邦宪(博古)的信(1944年8月31日)中指出: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內)构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它们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作为分散的个体经济,构成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內)的基础。这乃是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总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是机器而不再是手工。因此,他强调说,从农业基础过渡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25]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更明确地指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持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12]这是因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怕资

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2]。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又强调说:唯有经过民主主义这一过程,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就把我们的主张与民粹主义观点区别开来。毛泽东承认,民粹主义在中国和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泛的。^[25]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道:“在我的[正式]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25]因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25]。

毛泽东明确意识到并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并未拒绝资本主义必要的发展这一历史环节。他揭露道:“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5]毛泽东以列宁及其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为例,甚至提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25]。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26]1945年5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则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25]就是在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五四运动》文章中,毛泽东亦指出:“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

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14]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是持这种观点的。

当然,对于毛泽东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在研究时应适当地把理论主张同实践后果区分开来。冯友兰晚年认为,毛泽东原本是主张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反对“毕其功于一役”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本来就是这样主张的。可是,1954年的《宪法》过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毛泽东似乎也想合两步为一步、‘毕其功于一役’了。”^[27]正像上文所援引并说明的,这其实在毛泽东本人的有关著作中也是反复做过阐释的。胡绳在其晚年的回忆中,也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恰恰相反,“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他不仅仅在口头上反对,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鲜明地、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甚至可以说,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28]。

与上述评价不尽相同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在谈到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时指出,“在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上,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讲了许多话,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有任何含糊。……在这方面他在四十年代讲的许多话,有助于反驳认为毛主席是民粹派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都有相当的影响,也很容易按照这种观点把毛主席的前前后后的想法、说法、做法作一种歪曲。但毛主席是完全用无产阶级观点来看待农民的”^[29]。如果这一判断同样也适用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那么就意

味着毛泽东即使在现实的政策取向上其学说也完全不同于民粹主义。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注释:

①毛泽东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的报告中又说:“他(指陈独秀——引者注)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参考文献:

- [1]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M].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6-7,216.
- [2]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78,83.
- [3]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377.
- [4]博古文选·年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280,281.
- [5]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16.
- [6]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281,312,356.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355.
- [8]中国哲学发展报告1999[A].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47.
- [9]爱德华·H.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51.

- [10]丁守和.论“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J].哲学研究,1979(5):10.
- [11]李约瑟.四海之内[M].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60.
-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2,1031,807-808,1058,1060.
- [13]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M].王伟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1.
-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4,564-565,565-566,559,685,559.
- [15]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11.
-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4.
- [1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9.
- [18]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79,230.
- [19]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增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84.
- [20]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M].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80-181.
- [21]施拉姆.毛泽东[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组,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33,33.
- [22]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58.
- [2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55,155-158.
- [24]杨荣国.初学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186-187.
- [2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7,275,322,322-323,323,323,385.
-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
- [27]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63.
- [28]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99(3):5.
- [2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